

中国現代文学史

第二編（初稿）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語言文学系編

内部交流·僅供参考

北京师范大学

中國現代文學史_(初稿)
(第二編)

北京師大中文系編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目 录

第二編 中国革命文学新阶段 (1942—1949)

第一章 “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講話”的发表和 文艺思想斗争

第一節 抗日后期政治形势和解放区的生产、整风	
两大运动	(1)
第二節 革命文艺运动的成绩和存在的問題	(2)
第三節 毛泽东文艺路綫——文艺工农兵方向	(5)
第四節 “講話”的伟大历史意义	(23)
第五節 和混进革命文艺界内部的资产阶级思想斗争	(26)

第二章 解放区文艺运动和人民文学創作

第一節 毛泽东文艺路綫的貫彻和工农兵群众文艺	
活动及創作	(46)
第二節 戲 剧	(69)
第三節 小說、报告文学	(109)
第四節 詩 歌	(167)

第三章 国統区的文艺运动和文学創作

(一)	(198)
(二)	(203)
(三)	(206)
(四)	(225)
小 結	(228)

中国現代文学史（初稿）

第二編 中国革命文学新階段

（1942—1949）

第一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講話”的发表和文艺思想斗争

第一節 抗日后期政治形势和解放区的生產、整风兩大运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抗日战争上繼續存在着两条相反的路線。到1938年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蒋介石就变本加厉地积极反共。从1939年底到1941年先后发动两次反共高潮，边区人民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坚持坚决自卫的方針，粉碎了反动派的进攻。

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高潮，是与日本帝国主义配合进行的。1941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对解放区进行大规模的扫蕩，实行烧光、杀光、搶光的三光政策。这时蒋介石军队大批投敌，进攻解放区。而1941年德国对苏联的进攻，更加强了国民党蒋介石反共反人民这股暗流，使解放区进入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面积縮小了，人口和军队也都減少了。

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克服了种种困难。全体軍民进行了英勇斗争，粉碎了敌人的联合进攻，实行了生产自給，精兵簡政，借以減輕人民負担。党又領導人民大規模的发展农业生产，救济灾荒。这种大生产运动奠定了反“扫蕩”和取得抗战胜利的物質基础。与此同时，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減租減息斗争，发展了民兵，在反“扫蕩”中給敌人以沉重打击，度过了这艰苦的岁月，巩固和扩大了解放区。

国民党蒋介石在配合日寇进攻解放区的同时，在国統区施行高压恐怖政策，破坏抗日救国团体，迫害进步人士，阻挠、封閉进步报刊等等。而解放区进行了民主建設，中国共产党在1942年到1943

年开展了整风运动。这次运动是对全党进行的一次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是无产阶级思想对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运动。这次运动要“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两个目的”，坚持的原则是毛主席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因而，这次运动的收获是大的。扫除了自1931年以来的教条主义影响，使大量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改变了原有立场；提高了理论水平，使全党得到空前的馬列主义思想的统一，为党的七大和抗战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整风运动期间毛主席发表了“改造我們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講話”等重要文章，正确地指导了整风运动的进行，并取得辉煌的胜利。

第二節 革命文艺运动的成績和存在的問題

“五四”以来的新文艺是在无产阶级思想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起来的，是和我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密切结合的，革命文艺它是人民革命事业的一个部分。正如毛主席所总结的那样：

“在我們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綫，就中也可以說文武两个战綫，这就是文化战綫和軍事战綫。……但是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們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縮小，其力量逐渐削弱。”

“五四”以来的中国革命文学运动，一开始就有正确的领导和方向。“五四”时期，以李大釗为首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份子，就和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文化作了坚决的斗争，高举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党直接领导了文艺运动，繼續与封建的，资产阶级的，买办的文艺作了坚决斗争；斗争扩大了新文化阵地。培养、锻炼了大批文化战士，伟大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魯迅就是在这种斗争中成长的。革命的文艺运动，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发展，同时又推动了革命斗争，

1927年以后，大資产阶级投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革命营垒，中国革命进入新的时期，革命由城市轉入农村。反革命的围剿，使革命深入了农村，同时也使文化革命深入了。

革命的文艺运动被分为两支兄弟部队，这就是苏区文艺队伍和在国統区的由党领导的以鲁迅为首的左联。

苏区的文艺运动，在党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文艺开始与士兵农民結合了，这給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提供了范例，創造了經驗。

左联的革命文艺运动，在反动統治者的严酷鎮压下，和各种各色的反动文艺思想进行斗争。粉碎了封建买办的“現代評論派”和“新月派”；揭露了“民族主义文学”的法西斯实质；駁斥了所謂“文艺自由論”的資产阶级的反动理論。

抗日战争期間，革命文艺运动在两种不同环境下进行團結人民，教育人民，反抗敌人打击敌人的斗争。

总之，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运动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有很大成績，为革命作了重大貢獻。

但是这个文艺运动也还存在着缺点。

首先是文艺方向問題，“五四”时期提过“平民文艺”，但这里的“平民”是指的城市小資产阶级和資产阶级知識份子。“文艺大众化”問題从1927年后一直作为文艺上的主要問題提出，并經過多次討論，但未得到实际的彻底的解决。在理論上既沒有闡述清楚，在創作实践上当然不可能更好的完成。許多革命文艺工作者仅仅是理論上認識文学应当为大众服务，但感情上是相差很远的，是很矇矓的，至于創作实践那就談不到了。“五四”以来的大部分作品，是描写資产阶级，小資产阶级，知識份子，服务的对象也是他們。不少革命的和进步的作家由于思想沒有得到改造，他們錯誤地理解文艺大众化就是創作大众能懂的作品，仅仅看作是語言問題，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解。因而他們描写的工农大众，只是衣服是工农的，而面孔却是小資阶级的。这是由于作家站在小資产阶级的立場去描写工农，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矛盾，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运动目标与創作实际不能一致。这在实质上是文艺运动中小資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

这个矛盾的原因在于在革命文艺队伍中，小资产阶级文艺作家占着极大数量。他们在思想意识上没有得到改造，所以无法使自己的创作实践与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目的统一起来。

抗战以后，有些文艺工作者进入解放区以后，仍然拒绝思想改造，正如毛主席所说：“有許多同志比較地注意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識份子，分析他們的心理，着重地表現他們，原諒并辯護他們的缺点，……有許多同志，因為他們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識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識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識分子上面。……他們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現来創作的……他們在很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滿腔的同情，連他們的缺点也給以同情甚至鼓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講話）。他們不接触工农，不深入工农，脱离了火热的斗争，文艺的題材显得非常狭窄。

文艺是为誰服务的問題沒有得到彻底解决，作家思想沒有得到改造，因此在如何服务这个問題上，就不能正确加以解决。“文艺大众化”的討論中，普及和提高被机械地分开了，在实践当中，又輕視普及，把提高放在首位。因而就出現了“关门提高”的錯誤傾向。就拿“講話”发表前的边区和部队文艺活动看。演戏必演大戏、外国戏，“魯艺”曾不适当强调学习西洋和古典作家，也片面的强调技术学习，硬搬史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很少考虑群众的接受水平和当前的革命斗争。这一系列的問題，就說明革命的文艺还没有和工农兵真正的結合起来。

其次，我們的革命文艺虽然打垮了各式各样封建买办的、资产阶级的文艺，但他們的残余还未被肃清，并且伪装起来，混在革命的队伍当中。而当1941年边区处在最艰苦的时期，敌我斗争非常尖銳的时期，就向党向人民进攻了，托派分子王实味和丁玲、肖軍、胡风、馮雪峯等人在这一时期，分別在解放区和国統区打出了反动资产阶级的黑旗，攻击党的政策，誣讟解放区。他們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否定世界觀的作用，通过所謂“暴露黑暗”达到攻击革命的目的。这一場斗争是当时革命斗争在文艺斗争中的反映。

因为“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存在問題需要解决，缺点需要克

服，各式各样的反动文艺思想需要清算，使革命的文艺更好地发展文艺更好地为当前革命斗争服务，因而在1942年5月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在这个会上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了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所企图解决而很久以来未能解决的问题。使革命的文艺在毛主席文艺路线的指导下，出现了全新的繁荣景象。

第三節 毛澤東文艺路線——文艺工農兵方向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是文艺界一件重大事件，纪念“讲话”发表十周年的时候，人民日报社論曾指出“讲话”在中国革命文艺运动上第一次明确地深刻地解决了文艺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文艺和工农兵群众结合的问题，并由此给文艺工作者和一切革命知识分子指出了如何改造自己以求得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如何为工农兵群众的正确道路。毛主席在“讲话”中结合着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实践，卓越地发展了列宁关于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这个问题，不仅在文艺工作中是重要的，在其他一切文化工作中和革命工作中同样是根本性质的问题。“讲话”总结了“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并彻底解决了“五四”以来革命文艺运动中存在的根本问题。明确地提出今后的文艺的新方向，使革命文艺运动工作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时它又是反击敌人的进攻，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最犀利的武器。

一、文艺為工農兵服務問題

文艺为谁服务是一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也是决定文艺性质和发展方向的问题。毛主席创造性地发挥了列宁的“论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的观点，具体地解决了一系列的重大问题。早在1905年列宁就曾经说过无产阶级文学不是替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替百无聊赖和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替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根据列宁的原则，毛主席明确地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他说：“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

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資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識分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够长期地和我們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我們的文艺，應該為着上面說的四种人”。

在阶级社会里，文艺是为一定的阶级或集团服务的，“超阶级”的文艺、“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那是沒有的，只不过在堂皇的冠冕下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服务罢了。

封建主义文艺就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如宫廷詩、汉乐府春宮画等。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文艺，如梁实秋林語堂这一类人的作品，以及“新月派”、“第三种人”、“民族主义文学”等派别的作品，充滿了沒落頹废和法西斯思想的东西。抗战时期，有周作人，张資平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的文艺；以后在延安有王实味，丁玲等人的反党作品也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奴才思想。所有这些文艺都是为反动統治者服务的，与为“千千万万劳动者服务”的文艺是相对立的。

毛主席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跟着也就解决了作家的立場問題。因为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場，他才能熟悉工农兵，才知道他們的要求，才能正确表現他們，才能真正的为他們服务。从“五四”以来的文艺运动証明了这一点，站在非无产阶级立場的作家，是不可能为工农兵服务的。

文艺既然为工农兵服务，那么，工农兵必然是文艺的对象，也是描写的中心。工农兵是革命的主力，他們的活动是推动革命发展的，推动历史前进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当前斗争服务，它教育千千万万的工农兵群众，激动他們奋发前进，为革命事业斗争。这种文艺才是符合于工农兵的根本利益的文艺。而現實生活中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是艺术的丰富源泉和矿藏，人民的英雄事蹟又是最能激励人們前进的东西，所以作家們必須表現工农兵。必須明确为工农兵創作。不仅如此，还必須帮助工农兵掌握文艺的武器，發揮文艺的更大作用。

在文艺創作中，我們必須反对小資产阶级的“自我表现”傾

向，带有这种倾向去創作，是不能表現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的，而是歪曲工农形象的，他們的主人翁会是滿脑袋的小資产阶级思想，带有强烈的小資产阶级感情，与工农兵格格不入的。

作家要为工农兵服务，只有站到无产阶级立場，这就要求作家从一个阶级轉变到另一个阶级，改变原有的立場原有的世界觀。必須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进行深入地認真地思想改造。

但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正如周揚同志分析的：“小資产阶级知識分子大都有他們个人奋斗的历史，这个历史有时就成为他們前进中的包袱，他們生活上长期地习惯于单独工作或在很小的集团內工作，而在文艺修养上又往往感染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資产阶级文艺的影响較深，这一切就养成了小資产阶级知識分子特有的个人主义心理和习惯，妨碍他們的前进，妨碍他們和工农群众的結合。小資产阶级知識分子在沒有經過認真的思想改造以前，不管口头上如何称贊群众，如何表示願意接近群众，实际上常常是輕視群众，并安于脱离群众的状态的。他們充滿知識分子的偏見、錯覚和幻想；他們总是看个人重于群众；而他們表現工农群众的时候，不是将工农的形象描写为他們想象中的呆头呆脑的人物，就是描写为完全小資产阶级化了的，狂想的，神經質的人物。在不少文艺工作者中間，这种小資产阶级知識分子的个人主义的恶习是根深蒂固的。”概括地說，沒有經過改造的知識分子常常是頑強地表現出“以自我为中心，名利为半徑”。这样的人如果不經過思想改造，是无法解决为工农兵服务的問題。所以毛主席在“講話”中尖銳地批判小資产阶级思想以后強調指出：“要解决这个問題，非十年八年的长时期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們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們的文艺工作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馬克思主義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們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为无产阶级的文艺”。

“五四”以来，革命文艺提出过“大众文艺”为大众服务为革

命服务。但为什么人的問題并沒有解决或者沒有明确解决，不明了其关键在于作家思想立場改造的問題。毛主席針對这个情况給予了正确的令人信服的解决。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許許多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遵循毛主席的指示，深入实际，深入火热的斗争，改造小資产阶级思想，因此我們的文艺工作者面貌为之煥然一新，解放区的文艺呈現了一片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景象。从那时候起，中国革命文艺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

毛主席文艺工农兵方向提出后，資产阶级的文艺家总是用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反对这一方針，胡风反革命集团就是反对毛泽东文艺工农兵方針的最坚决的代表。他們提出許多荒謬的理論与这一方針相对抗，說什么“主观战斗精神”，說什么“那里有生活，那里就有斗争”，反对作家思想改造，反对深入火热的斗争。他們把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講話”污蔑为封建的“图騰”，可見其用心之狠毒。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是我們的文艺方向。任何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作家，都是愿意改造自己，以馬列主义的世界觀觀察生活，爱人民所爱的，恨人民所恨的。任何抱着資产阶级观点不放，坚持原来立場不改的人，也必然要走向反党反人民反对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上去。所以文艺为誰服务的問題，是一个原則的問題。

二、如何為工農兵服務的問題

我們的革命文艺既然是为工农兵服务的，那么到底如何去为工农兵服务呢？毛主席指出：“我們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謂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謂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这里毛主席強調了无论是提高或者是普及都應該从工农兵需要出发。所以毛主席接着說：“用什么东西向他們普及呢？”一切封建阶级的，資产阶级的，小資产阶级的都不行，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毛主席肯定，必須以工农兵所需要，所能够接受的东西才能为工农兵服务。也就是要求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必須从工农兵的需要出发，从工农兵的可能接受水平出发。

那些是工农兵需要的，如何才能真正的创作出工农兵需要的东西呢？毛主席告诉作家“在教育工农兵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

毛主席从唯物辩证的观点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而精辟的分析。从而论述了文艺创作的许多重大问题。

他肯定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文艺作品只能是社会生活，客观现实的反映的产物。革命文艺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而反动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反动作家头脑中的歪曲反映的产物。因此，社会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所以毛主席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因此毛主席号召文艺工作者到创作源泉中，吸取艺术的生命力，创造出能够鼓舞人民前进的作品来，他说：“中国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的过程。”这种深入工农兵，深入火热的斗争，深入创作的唯一广大丰富源泉中去正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真正的无产阶级文艺，创造出为工农兵需要的文艺来。

十几年来经验证明：我们的文艺工作当它和群众联系密切的时候，总是显得生气勃勃的，方向明确的；而一旦失去或减弱了这种联系的时候，就立刻变得没有生气，没有方向，以至陷于停滞和瘫痪的状态。对文艺家来说也是如此，他能长期与工农群众生活在一起，到工厂农村长期安家落户，就能写出好的作品来。赵树理同志就是一个鲜明的实例，他的作品“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等获得了群众热烈的欢迎。反之，把自己的生活与劳动人民远离，甚至筑起一道墙来，那么创造出来的作品，必然

是缺乏艺术生命力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甚至是歪曲現實生活的。这样的作品必然得不到工农兵的欢迎和批准。肖也牧就是一个实例。他的“我們夫妇之間”，由于以資产阶级知識分子的眼光和趣味歪曲劳动人民的形象，玩味着从旧社会带来的坏思想和坏习惯，把政治庸俗化，因此遭到人民的唾弃。

人民的生活是文学艺术創造的唯一源泉，但文学艺术决不是照象式地反映人民的生活，或者自然主义的反映人民生活，因此毛主席进一步从文学艺术的特性和作用出发，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一方面肯定了生活本身的美，同时又指出了文学艺术又胜于生活本身。这是馬克思主義的美学观点。从这里我們联系到毛主席最近提出的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結合的創作方法。“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設的斗争中，就是把实践的精神和远大的理想結合在一起的，沒有高度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就不足以表現我們的时代，我們的人民，我們的工人阶级、共产主义的风格。”只有把生活“更集中，更典型，更理想”反映出来，才能更好地鼓舞人民战胜困难不断革命的前进信心。十多年来，我們的文艺按照了毛主席这一指示，因而收到了很大的成績。

既然人民生活是文艺創作的唯一源泉，那末此外也就不能有第二个源泉。至于有人認為古代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也是源泉，这是极端錯誤的。毛主席闡明：“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們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創造出来的东西。我們必須繼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們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創造作品时候的借鑑。”所謂借鑑决不是模仿，也不能代替創造。文学艺术中对古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是最沒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我們的文艺必須是按照毛主席說的深入人民群众火热斗争，深入工农兵，在創作时繼承优秀的传统，吸取其精华，这样才能創造出更好的作品来。

至于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毛主席指出它們是統一

的辯証的关系，決不是相互对立的东西。对于工农兵，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毛主席強調指出在当时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輕視和忽視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錯誤的。毛主席所規定的有名公式：“我們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們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这正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艺术的客觀法則。这也是馬克思列寧主义文艺理論的发展。普及和提高都是沿着工农兵群众的思想艺术水平，他們的斗争需要，不断的辯証发展着的。任何机械的閹割和片面的发展，都是违反毛主席所提出这一客觀发展的法則的。

十多年来的事实証明，遵照了毛主席指示的原則去做，那末就会受到工农兵群众的欢迎，文学艺术就能起巨大的战斗作用，鼓舞和教育作用。普及为主，是文艺的群众路綫，它迅速的使文艺在群众中发生作用，同时也尽快地使群众掌握了文艺的武器，找到了創造民族形式的正确途徑，促使了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

坚持資產阶级立場的文艺家，反动的文艺家千方百計反对普及为主，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借以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針。馮雪峰和胡风就是这类人的代表。馮雪峯在“論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中用詭辯来反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反对毛主席提出的“第一步需要的还不是‘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的原則，他这样写道：“在一般革命的新文艺的現在的基础和状态上，它的不‘普及’（大众化）是它的不‘提高’，而取得它的‘提高’（高度地反映人民的现实生活，斗争要求和力量，以及和这相适应的民族形式之創造）必須取得它的‘普及’……”馮雪峰在这里把提高解释成为就是普及，从而根本否定了普及。因为根据邏輯推理，由“不普及是它的不提高”不难推論出馮雪峰的主导思想实乃不提高就是不普及，也就是說，要普及就必须提高。这样普及就被否定了。然而当时工农兵面前的問題，毛主席曾已明确地指出：“他們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們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資产阶级的統治，不識字，无文化，所以他們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們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識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們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們的团结，便于

他們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斗争。”而比較容易为人民大众所迅速接受的，又莫过于較为简单浅显的东西，至于高級的作品，固然比較細致，不过却难以生产，也难以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的。由此可見，馮雪峰的“提高”根本不是从工农兵的基础上提高，而是引导人們走到資产阶级“象牙之塔”中去提高。否定普及是因为他根本看不起劳动人民，誣衊劳动人民，把愚昧无知麻木不仁，“疯狂”“痙攣”等字眼加在劳动人民身上，因而根本不可能为工农兵服务，只能为資产阶级服务罢了。

三、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毛主席关于党的文艺工作和整个党的工作关系即文学的阶级性和党性的論述，也是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講話”的重要內容。根据列宁关于党的文学原理加以論述，列宁說：“对于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学事业不但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賺錢的工具，而且它永远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打倒非党的文艺家，（非党的文艺家这里是指站在非党的立場的文艺家——引者注）打倒超人的文艺家！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一个統一的，伟大的，由整个工人阶级全体觉悟的先鋒队所开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机器的齒輪和螺絲釘。”“文学事业應該成为有組織有計劃的統一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的一个組成部分。”毛主席根据这一原則非常明确地指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綫的。为艺术而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說：“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

毛主席根据了列宁的党性原則，并且发展了这一原則。同时也批判各种各样的謬論指出“为艺术而艺术”“超阶级的艺术”那是不存在的，实际上他們提出这个口号时，就带有政治倾向，就是为一定的阶级或集团服务的。在阶级社会里总是有一定的阶级立場，因而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他們在作品里反映生活和判断生活

的时候，总不可能不流露出一定的政治倾向。作品中的政治倾向性有时可能直接地表現的，有时可能表現的很曲折。不管怎样作品中总是有政治倾向。伟大的魯迅就响亮提出自己的文学是“遵命文学”，遵革命的前驅者之命，遵革命之命，这不正是雄辯地說明文艺的阶级性嗎？右派分子修正主义者他們坚决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实质上是要求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他們通过各种的論調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他們說：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就不真实了，社会主义文艺有鮮明的政治倾向，因此社会主义文艺就不真实。这真是荒謬絕伦！难道說魯迅的“遵命文学”不真实嗎？周揚同志正确地提出：“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是最真实的文学艺术。因为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它从来不害怕揭示生活的真实状况。只有剥削阶级，为了蒙蔽劳动人民的眼睛，才需要掩盖现实的真象。”問題是什么是真实？艺术家站在什么立場和抱着什么目的来描写真实呢？文学艺术是生活的反映，而现实生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有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反映现实的时候，我們与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有根本分歧。教条主义者看不見或不愿意承认人民内部的矛盾，就必然走到文学艺术上的无冲突論。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故意模糊或掩盖人民同人民的敌人之間的矛盾，而把人民内部的矛盾，特別是被領導者和領導者之間的矛盾当作旧时代的被压迫的人民同反动統治者的矛盾来看待，把本来是人民之間的是非問題，誇大成为敌我的問題。因此在他們眼中，只有揭露阴暗面的作品才是真实的，而歌頌光明的作品就都是“粉飾现实”的“不真实的”，这真是豈有此理。难道說我們的社会主义现实的主流都是阴暗的死气沉沉的嗎？只有带着有色眼镜的右派分子才这样認為。在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中，缺点和錯誤当然是有，但决不是主流，而是“九个手指头与一个手指头的关系”，何况对这一个手指头所采取的态度是医治而不是把它砍掉。我們社会主义现实的主流是生气勃勃的、强有力地奔腾澎湃、前进着的东西。我們站在社会主义立場描写现实，揭示现实生活的主流，使人民看到主流，为創造更美好的现实而斗争。对这个問題赫魯晓夫同志說出了精辟的見解：“文学艺术作品在真实地描述社会和人民的生活的时候，既

要展示社会主义現實的积极的光輝的和鮮明的方面——社会主义現實的基础，也要反映对缺点的批評以及对妨碍我們一往直前的消极現象的揭发和譴責。”只有这样文学艺术才能真实反映社会主义現實，才能不断鼓舞人民前进。如果按照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的观点那不是反映社会主义現實的真实了，而是謾謗誣衊現實，不能鼓舞人民前进只能使人民灰溜溜，有利于帝国主义有利于反动派，不利于我們社会主义事业。苏联作家杜金采夫的作品“不仅仅是为了面包”，我国的右派分子王蒙的“組織部新来的青年人”豈不都是明証嗎？

我們的文学艺术是为一定革命时期的政治服务的，也就是說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如果把它理解为为某一种具体政策服务那是狭隘了。要求作家按照政策条文来写作，那是教条主义。但修正主义者借反对这点否認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則是反动的。秦兆阳就是一个代表。他說：“为政治服务和为劳动人民服务是从政治上提出問題，它應該是作家的世界觀的一部分，但它同时也是要求现实主义文学走向更加完美——更加提高其对于現實和对于艺术的自賞性”。原来秦兆阳認為为政治和为劳动人民服务“只是作家世界觀的‘一部分’”，那末还有“一部分”或“大部分是什么呢？除了为劳动人民服务之外还为别的什么人服务呢？不为我們的政治服务还为什么人的政治服务呢？其实很明显，他的“底”就是为資产阶级服务，为資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对于革命的作家來說，为劳动人民服务，为革命服务是他的世界觀的基础，是最根本的东西，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一部分”。秦兆阳还把艺术与政治对立起来，好象有了为政治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就妨碍艺术的“更加完美”似的。这难道不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嗎？

另外秦兆阳还認為“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和为人民服务應該是一个长远性的总的要求，那就不能眼光短浅地只顧眼前的政治宣传的任务，只滿足于一些在当时能够起一定宣传作用的作品。”从这一段話里明显地看到秦兆阳提出“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和为人民服务應該是一个长远性的总的要求”的主张来和文艺“为当前的政治任务服务”相对立，實質上就是取消了文艺为革命的政治服务。上面已